

回到鲍姆嘉通

文 / 向 杰

摘 要：18 世纪，在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背景和影响下，鲍姆嘉通以无比的勇气建立了一门学科来专门研究感性认识，即美学。而之后的很多美学研究者却背离了鲍姆嘉通的传统，如黑格尔；而另一些人，如康德、克罗齐、尼采等，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鲍姆嘉通的传人，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却被自己的无意识带回到理性的牢笼里。因此，我们主张美学应该回到鲍姆嘉通，但如何回到鲍姆嘉通？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到：鲍姆嘉通的感性认识就是我们的感性体验。打通了这一关节，我们就回到了鲍姆嘉通。

关键词：鲍姆嘉通；感性体验；感性认识；理性主义；感性学；美学

二百多年过去了，关于美学的学科定位，转了一圈，又要回到鲍姆嘉通，有些沮丧，是不是？不，事情有了新变化，我们没打算完全回到鲍姆嘉通。

一、为什么要回到鲍姆嘉通？

在笛卡尔以前，不管是科学研究，还是哲学思辨，都有主观感受在里面，并没有纯然客观的科学方法。自笛卡尔确立“我思故我在”的原则以来，理性被确定为人类最好的品质，是与上帝的神性相通的一种能力。以崇尚理性为最高目的的理性主义也流行起来。经过莱布尼兹和沃尔夫对笛卡尔思想的进一步发展，理性主义的地位更加崇高。在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中，人类的认知能力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，高级的理性认识活动已经有很多学科进行了研究，而低级的感性认识活动还没有一门学科进行研究。毫无疑问，情感问题就是感性认识问题，只不过是理性认识的低级形式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亚历山大·哥特利布·鲍姆嘉通（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, 1714—1762）意识到：自古希腊以来，人类的能力就被分为知、情、意三个部分。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逻辑学研究；意志能力有伦理学研究；而关于人类的情感能力竟然没有学科对其进行研究。鲍姆嘉通正是从这样的理性思考出发，觉得有必要建立一门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。他把自己研究这一问题的书命名为“Aesthetic”。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。鲍姆嘉通在 1735 年的博士论文《诗的感想：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》中，应用了“Aesthetic”这个词：“‘可理解的事物’是通过高级认知能力作为逻辑学的对象去把握的；‘可感知的事物’（是通过低级的认知能力）作为知觉的科学或‘Aesthetic’（美学）的对象来感知的。”^[1]显然，在该文中，他把“Aesthetic”

一词理解为低级认知能力把握“可感知事物”的学科，通常人们理解为“感性学”。“Aesthetic”一词，汉语直译为“伊斯特惕卡”，意为“感性学”。即希腊语的Asthetik 源出aisthetikos，意指感知、感觉。但在从日本引进到我国时，被翻译成了“美学”。

鲍姆嘉通在《美学》导论中，开宗明义，对美学这门学科进行了界定：“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、低级认识论、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，是感性认识的科学。”^[2]这个定义很重要。它从四个角度肯定了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学。第一，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；第二，作为低级认识论；第三，作为美的思维的艺术；第四，作为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。第一点指出艺术是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；第二点指出美学是一种认识论，但是一种低级的认识论；第三点和第四点则是从思维方式来讲的，前者被后人总结为“形象思维”，后者则是讲与理性思维的关系。鲍姆嘉通为我们确定了感性认识的范围，也就是美学研究的范围。不管是自由艺术、低级认识，还是美的思维、与理性类似的思维，都是基于感性认识的。专门创立一门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，这不仅需要见识，还需要理论自信。如果联系当时的莱布尼兹-沃尔夫理性主义对感性认识的看法，就不得不佩服鲍姆嘉通的勇气。自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者认为，只有理性认识才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，感性认识不仅没有意义、没有价值，它对理性认识反而构成干扰，使理性认识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。因此，理性认识必须尽量避免感性认识的影响。正是在莱布尼兹-沃尔夫的理性主义体系内，鲍姆嘉通意识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应该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，不应该被忽视。他因此建立了一门学科来专门研究感性认识。

两百年过去了，我们对感性认识的研究有何进展呢？说起

来令人羞愧。后来的很多美学研究者背离了鲍姆嘉通的传统，认为美学不应该研究感性认识，而是应该研究艺术。如黑格尔就说：“‘伊斯特惕克（Ästhetik）’这个名称实在是不完全恰当的，因为‘伊斯特惕克’的比较精确的意义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科学。”^[3]他其实是全盘否定鲍姆嘉通，在他的鸿篇巨制《美学》中，竟然一次也没有提到他。因为他认为美学是研究艺术的科学，是艺术哲学。在这点上，黑格尔误解了鲍姆嘉通。艺术也是鲍姆嘉通的重要研究对象，而且，鲍姆嘉通希望弄清楚艺术与感性认识之间的关系。鲍姆嘉通与黑格尔的区别在于：鲍姆嘉通美学的范围要比黑格尔美学的范围大很多。当然，也可以这样理解：鲍姆嘉通的感性学与黑格尔的美学并不是一回事。后人继承了黑格尔，而把鲍姆嘉通抛弃了。

黑格尔以后，那些所谓的美学大多以研究艺术为主。人们接受了黑格尔的意见，以为对感性认识的研究应该是心理学研究的内容。但是却把美学与艺术哲学等同起来，可是又很不容易说清它们之间的区别，以致这段公案至今不得解决。

我们认为，虽然鲍姆嘉通的出发点是有问题的（他的出发点是二元对立的理性主义），但对感性认识的重视和研究是值得后人肯定和钦佩的，具有重大意义。人类对理性的运用已经登峰造极，理性主义的发展已经反过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。科学以及哲学，凡是以理性主义为研究方法的学科，并不真正关心感性，也不关心引起感性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现象。它们真正关心的是现象背后的本质，也就是现象背后的同一性、普遍性和规律性。本质是简单的，它是通过忽略丰富多彩的现象和细节概括出来的，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“抽象化”。“抽象化”简化了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，让我们觉得一切都有规律，一切都有秩序，一切都很和谐，一切都很美好。但是，我们要知道，这种“抽象化”省略了太多的东西，包括一些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。比如现象性、感受性、身体性、有限性、局限性，等等。造成了我们与现象世界扭曲的关系。这不仅忽视了我们的感性体验，还严重贬低了感性体验。在理性或逻辑斯中心主义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反对的大背景下，回到感性，回到感性体验，回到鲍姆嘉通，或许就是补救过度理性主义过错的一剂良方。

二、为什么是现在？

鲍姆嘉通的传统中断了，但并不是没有继承鲍姆嘉通传统的人。康德、克罗齐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成是鲍姆嘉通的传人。鲍姆嘉通的美学有两个基本问题没有解答或者答案不令人满意：第一，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是一种什么关系？感性认识如何发展到理性认识？鲍姆嘉通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，是一种低级的认识，理性认识高于感性认识。如果真的如此，那么感性认识是如何发展到理性认识的？第二，感性认识

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活动？它为什么是一种认识活动？康德的美学回答了第一个问题。他是从整个哲学体系出发，认为在理性主义之前，应该有一个经验主义的基础，在分析理性和实践理性之前，应该有一个感性基础。否则，就无法说明理性认识的来历。在康德看来，感性认识就是一种审美判断，一种直观的判断。借助于知性，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。他写道：“我们的一切知识从感官开始，以感官前进到知性，最后以理性结束。在理性以外，我们没有再高的能力来把直观的材料加以制作，从而把它放在思想的最高的统一性之下了。”^[4]克罗齐解决了第二个问题。克罗齐认为，感性认识是对现象的认识，本质就在现象之中，而不是之外。因此，对感性而言，认识了现象就是认识了本质。这种现象是一种不同于理性认识到的现象，而是一种“直观”。就是说，人在直观之中，就已经把握了本质。许多人不理解克罗齐的观点，认为有神秘主义的味道，其实并不神秘。但是，许多人并不认同鲍姆嘉通。就是康德和克罗齐一开始也不认同他。黑格尔几乎已经形成了定论：美学就是艺术哲学，是研究艺术的科学。这种变化可以说是必然的。第一是因为理性主义的高歌猛进，尤其是作为理性主义具体体现的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绩，带来了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。感性被这种理性主义的欢呼所掩埋、忽视。理性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也进入到艺术研究领域之中。艺术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得到了显著的重视。感性，作为理性认识的不利因素，理所当然应该被有意地忽略；第二个原因是人们发现，即使要研究感性，感性这东西也无法被研究。当我们试图对感性进行分析的时候，人们发现，感性（例如快乐）就不见了。就像歌德的一首诗：

彩虹般美丽的蜻蜓
背贴着喷泉拍打着翅膀
颜色变化着，时暗时明宛如一条变色龙
时红时蓝
时蓝时绿
如果人们靠近
也许能把它色彩看个分明
但它飞来飞去，徘徊不停——啊，别作声！
它在一条柳梢上闪耀
我一手把它逮到
要把它真正的色彩
看个究竟
原来——它只是令人伤感的蓝色！
——要把快乐剖析的人啊，这就是你最后的命运^[5]

蜻蜓有美丽的色彩。可是当我要“看个究竟”的时候，却发现它“只是令人伤感的蓝色”！我很快乐，我正要“看个究

竟”，我看到了真相。而真相竟然是“令人伤感的蓝色”！快乐不见了！感性就是一只“彩虹般美丽的蜻蜓”，不能分析。

但是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
尼采高举起反对理性主义的大旗，赞扬狄奥尼索斯的酒神精神。酒神精神是人性的感性精神，是建立在肉体之上的一种生命力的张扬。它与理性精神截然相反。尼采影响了20世纪几乎所有的哲学家。许多人反对理性主义。如果说胡塞尔、维特根斯坦、海德格尔、萨特、伽达默尔等人的立场还不是那么鲜明（他们的理论都有反理性主义的倾向）的话，那么，弗洛伊德、荣格、梅洛-庞蒂、福柯、波伏娃、拉康等人，反理性主义的倾向已经十分鲜明了。反理性主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感性的重视。20世纪对精神病的研究、对医院、监狱、女性以及性的研究，都是建立在对感性的研究基础上的。

遗憾的是，这些研究都有一个方法论的缺陷：他们都没有突破歌德的批评。他们依然想对所有这些东西“看个究竟”。对这些东西可以“看个究竟”，但“看个究竟”的对象已经不是感性体验了，哲学家和科学家研究的是引起感受的外在刺激物（医院、监狱、女性、性），这些刺激物不等于感性体验。对这些刺激物的分析也不等于感性认识，而是理性认识了。他们有意地反对理性，却被自己的无意识带回到理性的牢笼里。

不管如何，20世纪的思想家把我们从对理性的过度关注那里带了回来，让我们重新关注感性认识。这样，历史已经做好了铺垫，我们就有条件回到鲍姆嘉通了。

三、回到鲍姆嘉通意味着什么？

鲍桑葵对此做了一个经典的解释：“美学的范围就是整整一系列的心理能力。这些心理能力代表处于混乱状态的任何联系，但是这些心理能力合在一起又构成了‘analogon rationis（类理性），即理性在混乱的认识领域内的相似物或畸形变体。”鲍姆嘉通从莱布尼兹-沃尔夫的理性主义立场出发，创设了感性学来研究感性认识，无可避免地把感性学归为哲学的一部分。研究感性学的方法自然也是一种“二元对立”的观察、分析、综合的理性主义的方法。虽然鲍姆嘉通意识到了这种研究方法可能无法研究“感性”，但他还是采用了这种我称之为“哲学研究方法”的方法。

美学越来越挣脱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辨领域而走向日常生活，主张用感官体验来把握生活世界的现象。

对美学而言，现象是一个发展的观念。在早期原始社会的他意识阶段，现象是一种主观的现象。这意思是，一切现象都具有情感、生命、活力、灵魂。在个物意识时期，环境的任何细微的变化，都会影响主体关注对象的变化。同一事物，在不同的时空会成为不同的事物。因为，它会“变形”。“变形”表明了原始人意识的不稳定性，从脑神经学角度看，表明了原始

人的神经模式（记忆痕迹、神经回路）不稳定。这种不稳定投射到客体上，就成为客体规定性的不稳定。这种不稳定导致不可能产生认识活动。但是，原始人强烈的情绪体验补偿了这一局限。他们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所有感官现象之中。而这时的原始人与他们的意识发展水平相适应，是具有强烈情绪的原始人。他们是一种情绪化的存在，全部交流是通过情绪表达实现的。在神话意识阶段，情绪依然十分强烈，但是在“变形”的背后，事物开始具有了“本性”。这个“本性”是稳定的，始终不变的。就像孙悟空一样，不管他有多少变化，他猴子的本性是不变的。这是因为原始人的意识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：他们的脑神经模式有了一定的稳定性，投射到客体上，就体现为客体的规定性获得了稳定性。

在这一阶段，原始人是用“变形”的理论来解释世界的普遍联系的，如果他们有理论的话。而“变形”就依附于原始人的全部情感和情绪。他们的爱、恨、喜欢、厌恶等情绪，统统寄托在这些变化着的现象上。这一时期原始人所体验到的感官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“主观现象”。

对这种主观现象当然不能认识研究。因为，那时认识能力还没有出现。就像伽达默尔所说的，体验先于认识。这一阶段，人们对世界的把握是一种体验的关系。人，还没有从他生活的环境中把自己区分出来（就是说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），他与生活其间的环境融为一个整体（这就是中国人津津乐道的“天人合一”），但人又有了意识，有了把握感官世界的欲望，于是，自然而然就从整体的内部“体验”感官世界。这种体验是不能分析的，不仅是因为还没有分析的能力，也因为一旦分析就没有体验了。这是美学关注的“主观现象”。

后来，人类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，进入到自意识阶段，把自己与环境分开了。主体与客体的“二元对立”产生了，认识活动成为可能。人类开始对立地观察、分析客体，努力寻求不同客体背后那不变的“本性”。但这时候，“本性”被另一个更具一般性的概念取代。这个概念就是“本质”。在由现象组成的感官世界之外，还存在着一个由本质组成的先验世界。这个先验世界不是人的感觉所能感知的世界，它隐藏在无数现象组成的感官世界的背后，需要理性才能认识。这种观念正是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核心。这时候的现象就是一种“客观现象”。这种现象少有主观情绪的投射（主观情绪越来越少），认识活动就是“透过现象看本质”。哲学诞生了。对哲学而言，现象并不重要，现象背后的本质才是追求的目标。为了更深入地追求本质（同一性、普遍性、规律性），从哲学中诞生并分离出各种各样的具体学科。天文学、地理学、物理学、生物学、心理学、医学、化学等科学出现了。

这一时期，毫无疑问是哲学的时代。美学成了哲学的奴婢。在“二元对立”的哲学眼光审视之下，“主观的现象”变成了“客

观的现象”，变成了科学研究的纯粹现象。进入20世纪之后，由于理性的发展，理性主义的胜利，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。后果之一是人类心灵的严重分裂。理性主义造成心灵与物质世界的对立是如此严重，以至于不管是道德至上还是物质利益至上都是不可理解的，不可接受的。因为，一个有着道德洁癖的人与一个有着感官享乐的人都是病人。现代社会造成了无数的神经病患者。更为恐怖的是，在理性主义的指导下，不同文化的人群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严重对立，就像主体与客体严重对立那样。不惜发动战争消灭对方。两次世界大战固然有具体的政治、经济原因，但造成这种严重对立的无疑是理性主义。当然，理性主义还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之中，尤其是外化为程序化的冷冰冰的非人的社会组织。这些组织以政府、公司、政党、社会意志的形式影响着人类的生活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人类的生活。英国作家乔治·奥威尔的《动物庄园》、《1984》和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，就形象生动地表现了理性主义的专制性。于是，反理性主义的思想家和思潮出现了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反理性主义的产物。这时候，美学的机会来了。20世纪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潮流，这些潮流按照时间顺序被概括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。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它们都是反理性主义的武器和斗士。它们描述的现象既不同于“主观现象”，也不同于“客观现象”，而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，是一种“本质直观”的现象。更明白地说，这种现象是融合了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现象，是现象与本质的融合的产物，是一种既有强烈的主观情绪，又有理性认识的现象。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叫做“融合的现象”。现代美学研究的就是这种“融合的现象”。

所以，我们认为，真正的美学时代再次来临。美学有可能从哲学的护翼之下独立出来，壮大起来，形成自己独领风骚的伟大时代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看到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。美学——哲学——美学的变化轨迹昭然若揭。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：哲学——那种“二元对立”的学问——正在退场，退居幕后；而美学——那种“一元融合”的学问——正在出场，占据舞台的中央，主导人类的感受经验，为创建一个更好感受的幸福社会而奋斗不息。

四、如何回到鲍姆嘉通？

这是一个问题。能不能回到鲍姆嘉通，就看如何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认为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他所说的“感性认识”。鲍姆嘉通对“感性认识”的理解受到莱布尼兹的决定性的影响。莱布尼兹把认识活动分为从低到高的四个层次：一是模糊的、含混不清的认识，这种认识最为低级，既没有形象，也没有表现形式，就像梦一样；二是若明若暗、不明了清楚的认

识，它可以认识和区别各种现象，却又不晓得道理，不能理智地给出定义；三是明确的、清晰的认识，这种认识可以给事物下定义或作出科学说明，比如用金子的定义去区别真金和假金；四是充分的、直觉的认识，这种认识能认识事物的全部特征，清楚了解一个概念中所含有的元素，并对它们集中概括，作出最完整的评述，是最完善的知识。这四种认识组成了一道阶梯，从模糊，到混乱，最后达到明晰，从“黑暗王国”上升到了“光明王国”。莱布尼兹将艺术与审美视为第二种认识，属于若明若暗、不甚明了清楚的认识，或是“明晰而混乱的认识”（clear and confused cognition）。这种认识如镜花水月，我们能感受到其存在，却又难以言表。莱布尼兹虽然也贬低感性认识的地位，不过他已提到了审美的问题，并把审美限于感性活动，将之和理性活动对立了起来。鲍姆嘉通接受了莱布尼兹的观点，认为感性认识是一种低级的认识，是第二层次的认识：若明若暗、不明了清楚的认识。它可以认识和区别各种现象，却又不晓得道理，不能理智地给出定义。简单地说，就是一种感官现象的日常体验，或者说就是“日常经验”。

我们认为，在认识活动之前，有一个体验活动的过程。体验活动是认识活动的感性基础。没有这个基础，认识活动不仅不可能，也没有意义。体验活动的感受性、直观性和现象性不仅决定认识的对象，还决定认识的方式、过程和态度。换句话说，“理性认识”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“理性”：它需要感性体验与它一道做出选择、判断和推理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认为鲍姆嘉通的感性认识就是我们的感性体验。体验的本质特点就是不存在“二元对立”的认识活动，只有“一元融合”的内在的体会。因为它不是主体对客体的把握。它是人对置身其间的整体的把握。

如何回到鲍姆嘉通？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：鲍姆嘉通的感性认识就是我们的感性体验，平时我们简称为“体验”。打通了这一关节，我们就回到了鲍姆嘉通。美学就是感性学了。或者反过来说也行：感性学就是美学了。

注释：

[1][2][德]鲍姆嘉滕.美学.简明.王旭晓译.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1987.169页,13页

[3][德]黑格尔.美学.第一卷.朱光潜译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6.3页

[4][德]康德.纯粹理性批判.韦卓民译.武汉:华中师大出版社,2004.318页

[5][德]卡西尔.启蒙哲学.顾伟铭等译.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1996.336-337页

作者单位：向杰，中共四川省宣汉县政法委员会

编辑：李光远